

乐观倾向问卷在中学生中的修订

范越阳¹, 施建农²

(1.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1;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修订乐观倾向问卷,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乐观的理论模型。方法:分别对 156 名和 212 名中学生的样本进行了乐观倾向问卷的测试及信效度分析。结果:①与以往研究不同,本问卷呈现出三因子结构。②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三因子结构拟合良好:(χ^2/df 为 2.242,CFI 为 0.993,TLI 为 0.988 等;信度可以接受: α 系数 0.76,重测信度 0.70。③同时效度较好,和焦虑、抑郁、自我效能均有中等强度以上的显著相关。结论:满足性可能是隐含于乐观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子。

【关键词】 乐观倾向;信效度;满足性因子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0)01-0014-04

Revision of Dispositional Optimism Inventory in Adolescents

FAN Yue-yang, SHI Jian-no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the Dispositional Optimism Inventory (DOI) and discuss its theory model in Chinese culture. **Methods:** DOI was administered and evaluated with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two samples of 156 and 212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pectively. **Results:** ①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got a three-factor model. ②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three-factor model showed good fit: (χ^2/df was 2.242, CFI was 0.993, TLI was 0.988, et al. The reliability of DOI was acceptable: Cronbach's alpha was 0.76, and the retest reliability was 0.70. ③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was satisfying, DOI showed either moderate or high,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efficacy. **Conclusion:** The concept of optimism for Chinese culture may involve a unique factor of "Satisfaction".

【Key word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Reliability; Validity; Satisfaction

乐观是一种人格倾向,也是一种积极的解释风格,其核心是个人对未来事件的积极期望,相信事件的好结果更有可能发生^[1]。由于乐观倾向重要的健康适应意义,在最近几年渐渐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只是该方面的研究刚刚兴起,对乐观的定义和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还是承袭和翻译自国外的研究。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尽管采用相同的工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得的结果却和西方不尽一致^[2,3]。发展合适的测量工具已经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当务之急。

LOT-R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4]是近年来本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共 10 个项目,包含乐观和悲观两个因子,信效度较好。该问卷项目简单,施测方便,国内有关乐观倾向的研究多以此为借鉴。张勇、李恒芬等将其翻译为认知倾向问卷(The Cognitive Appraisal Orientation Test, CAOT),同样包含 10 个项目,并在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和普通被试中检验了其信效度。因素分析中舍去了负荷低的 3 个项目后,其余 4 个项目归为乐观因子,3 个项

目归为悲观因子。乐观因子具有较好的实证效度,而两组被试在悲观因子上并没有显著差异^[5]。这表明该问卷中有较多项目不太适合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乐观的内隐定义,需要进一步修订。

本研究基于 LOT-R 和 CAOT 中的项目,结合中国人对乐观的理解,将该问卷中不合要求的项目予以修改,并在中学生中检验其信效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问卷项目的修改

以张勇等的文献^[5]中所公布出来的 10 个项目,以及这些项目的英文原文^[4]为基础,以符合汉语习惯及东方文化观念为标准,修改其中部分项目。在张勇等人的研究中,项目 2、4、5、8 负荷高,一致性好,其聚合所得的乐观因子具有良好的实证效度。虽然项目 2、5、8 在 LOT-R 中的对应项都属于 filler item,不参与问卷计分,但既然它们已被证明有显著的实证效度^[5],就应该予以保留。而项目 3、7、9 聚合所得的悲观因子缺乏实证效度,1、6、10 负荷过低,都应该做某些改动和替换。

真正乐观的人并非只是相信自己的运气足够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670716)资助

通讯作者:施建农

好,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让好的事情发生。真正的乐观主要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内在的乐观,而不是把未来寄托在不可靠的运气上的、坐等好事降临的、消极的乐观。积极的乐观才是人们乐观的真正根源。纵观 CAOT 各项目,在张勇等人的研究中,实证效度良好的 2、4、5、8 都是将好事进行内在归因的项目;而其余应做修改的除项目 6 外恰好是将好事归因于运气;而项目 6(filler item)则是与乐观并没有明显关系。可见待修改项目之所以负荷过低,

或者缺乏实证效度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因而在修改和替换时,新项目将倾向于采用内在归因的表述形式。CAOT 中表述笼统的项目 1 被舍去,项目 3 和项目 7 做了修改,项目 6、9、10 做了替换,原则是尽量体现能力、信念等积极的内在因素对乐观的重要作用,而淡化运气等盲目的消极乐观因素。最后问卷仍包含 10 个项目,CAOT 中原来的项目及修改后项目的对照见表 1。

表 1 CAOT 原项目及修改后的项目

CAOT 原问卷项目	修改后项目
1.在某些时候,我常常希望最好的。	1.我觉得那些我担心的事最终几乎都会发生。 [△]
2.我很容易放松下来。	2.我很容易放松下来。
3.如果一些事情对我不利,那么将难以避免。	3.我常担心计划好的事会因为突然出现的意外而最终失败。 [△]
4.我总是对未来充满乐观。	4.我总是对未来充满乐观。
5.我从朋友那里得到很多乐趣。	5.我从朋友那里得到很多乐趣。
6.对我而言整日忙个不停是最重要的。	6.我相信有些人追求的目标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
7.我几乎从不指望事情按我的意愿发展。	7.我很少指望事情会像我希望的那样来发展。 [△]
8.我不会轻易感到烦恼	8.我不会轻易感到烦恼。
9.我几乎从不指望会有好事落在我的头上。	9.我感觉很多人每天都是在忍受着生活对他们的折磨。 [△]
10.总之我期望会有更多的好事在我身上发生。	10.我相信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恶劣,明天都会变得更美好。

注:其中标“△”的项目反向计分。

1.2 被试

在沈阳某中学整群选取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的学生进行测试。样本 1:预备测试的被试整群分布在四个年级,得有效被试 156 人,男生 108 人,女生 48 人,年龄为 14.6±2.3 岁。样本 2:信效度及焦虑、自我效能相关校标检验的被试同样整群分布在四个年级,得有效被试 212 人,男生 129 人,女生 83 人,年龄为 14.9±1.9 岁。其中 89 人两个半月后重测,这两个班在重测时同时测量 Beck 抑郁问卷。

1.3 测量工具

包括:①项目修改后的乐观倾向问卷;②Zhang, Schwarzer 等人完成的自我效能量表中译本(GSES)^[6,7];③国内修订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8];④国内修订的 Beck 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9],考虑到所测被试年龄较小,去掉了测量性欲变化的最后一项。

2 结 果

2.1 乐观倾向问卷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选样本 1 数据对预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所有项目的区分度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29~0.68 之间,见表 2。

对样本 1 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大变异法转轴,KMO 值为 0.74, $P<0.000$ 。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得三个因子,解释方差为 58.33%。因子 1 包含题项 2、4、5、8,因子 2 包含题项

6、7、9、10,因子 3 包含题项 1 和 3,各因子载荷见表 2。鉴于各题项因子荷载都较高,10 个题项均保留。

表 2 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及相应的因子载荷

项目	与总分相关	主因子上载荷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项目一	0.286**			0.848
项目二	0.577**	0.747		
项目三	0.430**			0.749
项目四	0.680**	0.768		
项目五	0.478**	0.714		
项目六	0.504**		0.758	
项目七	0.609**		0.597	
项目八	0.656**	0.708		
项目九	0.418**		0.622	
项目十	0.636**		0.577	

注: * $P<0.05$, ** $P<0.01$

2.2 乐观倾向问卷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得三因子结构,故而采用 amos4.0 对样本 2 数据按照三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χ^2/df 为 2.242, NFI 为 0.988, RFI 为 0.979, IFI 为 0.993, CFI 为 0.993, TLI 为 0.988, RMSEA 为 0.077, 表明该模型拟合较为理想。

2.3 信效度分析

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6,因子 1、因子 2 和因子 3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69、0.55 和 0.57。两个半月后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0。

采用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抑郁以及自我效能与乐观倾向的相关性作为本问卷的同时效度,相关系

数分别为 $-0.655(P<0.01, n=205)$ 、 $-0.700(P<0.01, n=204)$ 、 $-0.696(P<0.01, n=96)$ 和 $0.572(P<0.01, n=207)$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乐观倾向有三个因子,和前人的研究都不相同。然而仔细分析三个因子中的具体项目,就会发现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项目4“我总是对未来充满乐观”可以看作是对乐观倾向最为直接的测量,而它和问卷总分的相关在所有项目中最高也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和它聚合在一起的项目可以被认为共同代表了本文化氛围中对乐观的核心概念,即因子1。然而直接测量对未来的积极期待(西方对乐观的定义)的项目10“我相信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恶劣,明天都会变得更美好”却并未能归入因子1,虽然它在该因子上的载荷也到达了0.489。这表明东方文化背景下对乐观的内隐定义和西方存在着某种差异。

事实上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Lai和Yue在比较了香港和大陆的被试在乐观倾向上呈现出的不同维度之后,指出这种差别可能是来自中西方文化对乐观概念的不一致。对中国人来说,乐观主要意味着能以积极的态度接受当前的生存状况,其次才意味着期待未来有好事发生^[2]。知道满足的重要性并容易满足,即所谓知足常乐是中国文化对乐观的定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态度或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独立于生活环境的严苛性和对未来的积极期待的。和项目4同属因子1的还有项目2、5、8,这三个项目正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对当前现实的接受或满足程度。因而把因子1命名为“满足性因子”,它反映了东方文化背景下对乐观的独特认识。相应地,因子2的四个项目反映了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命名为“乐观因子”;因子3反向计分后也不能表明对未来的积极态度,反映的是对未来结果的消极期待,命名为“悲观因子”。

自乐观倾向的概念提出之后,对其理论模型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有的研究者基于LOT或LOT-R中乐观和悲观因子相关不高,以及多项研究中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所提示的结果,倾向于二因素模型^[2,10,11]。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二维理论始终未能从理论上说明高乐观和高悲观(二维理论的某一情形)是如何同时整合于一个人的个性之中而不致引起分裂的问题,而且一维模型同样能得到来自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证据支持,同时在中国应用时,乐观和悲观的项目并未分离(本研究中正

向题目和反向题目也未能在因子中分离),因而倾向于单因素模型^[3]。

仔细分析,以上争论很可能产生于不同研究者对乐观和悲观定义的不同。如果将悲观定义为不乐观,那么它们会是分属两极的一维结构;如果仅将悲观定义为对未来消极结果的期待,那么悲观和乐观就会分属于两个维度,同时也就空出了不乐观但也不悲观的空白地带。一维模型理论将不属于乐观的部分归属于另一极;二维模型理论则要求悲观和乐观地位的等同,不愿将悲观的概念扩大化,从而不接受那些不属于两极的不纯粹内容,坚持将之置于中间地带;分歧由此产生。

然而在中国人心中乐观所占的比重明显超过了悲观,大家不约而同地将问卷以“乐观”来命名就是证据之一。那么,乐观比悲观所多出来的那部分内容是什么呢?本研究中得出了三个因子,其中“满足性因子”被大家内隐地认为属于乐观的概念范围,这有可能使乐观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扩大。人们很自然地容易满足视为乐观,却并不认为对现状不满就是悲观,从而乐观的概念范围比悲观大了很多。这就可能使悲观在人们心目中的比重减小,以致只有和不乐观的成分合在一起才能与乐观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相当,才有资格和乐观居于相对平衡的两极。

也就是说,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加上“满足”构成了乐观的概念。持一维结构观点的学者,很可能就将“不乐观”和“对未来的消极期待”一起归入了悲观的概念范畴。而持二维结构观点的学者,则仅将“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和“对未来的消极期待”分别视为乐观和悲观。当然,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二者因为都没有纳入东方文化背景下乐观概念中独特的“满足性”,皆有不足之处。又因为满足被看作是乐观,不满足则既不属于乐观也不属于悲观,这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满足”在乐观概念中仅有0.5维?若是这样,那乐观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应该是1.5维的结构。这也许是对争论的一种调和,当然,目前还仅属猜测,亟待更多的证据。

本研究所修改的问卷是对前人研究的延续和补充^[5],数据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和焦虑、抑郁的相关系数也与其他研究^[4,12-14]中所得的结果类似,外部效度较好。两个半月后重测信度达到了0.7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也在可接受的范围。这表明本研究中将乐观归因于能力、信念等积极内在因素的项目表述方法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以后的研究可酌情借鉴。

只是本问卷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不高,有些项目如题项 10 和题项 9 还在其他因子上有较高的共同载荷(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项目的表述中乐观被同时归因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因素),有可能造成因素结构的不稳定。这需要在后续研究中给项目少的因子适当增加题项以提高信度,同时需要继续调整相关题项的具体表达方式以稳定因素结构。

参 考 文 献

- 温娟娟,郑雪,张灵. 国外乐观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1): 129-133
- Lai JC, Yue X. Measuring optimism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with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8(4): 781-796
- 吴雨晨,杨丽,梁宝勇. 乐观人格倾向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4): 335-338
- Scheier MF, Carver CS, Bridges MW. 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neuroticism (and trait anxiety, self-mastery, and self-esteem): 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6): 1063-1078
- 张勇,李恒芬,张亚林,等. 认知倾向问卷在儿童和少年情绪障碍患者中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5): 446-447
- Zhang JX, Schwarzer R. Measuring optimistic self-beliefs: A 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Psychologia*, 1995, 38: 174-181
- Schwarzer R, Arísti B. Optimistic self-beliefs: Assessment of general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thirteen cultures. *World Psychology*, 1997, 3: 177-190
- 舒良.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238-241
- 刘平. Beck 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191-194
- 陶沙. 乐观、悲观倾向与抑郁的关系及压力、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2006, 38(6): 886-901
- Cheng ST, Hamid P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in Chinese people: What does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meas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7, 32(4): 221-230
- 张勇,李恒芬,邹韶红,等. 中学生抑郁症与认知倾向、D 型人格及家庭环境的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174-176
- 张勇,张亚林,邹韶红,等. 中学生焦虑障碍与认知倾向、D 型人格及家庭环境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2): 90-93
- Kubzansky LD, Kubzansky PE, Maselko J.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 Bipolar opposites or separate construc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4, 30(8): 943-956

(收稿日期:2009-07-09)

(上接第 13 页)

- Wetzler S. The millon clinical multiaxial inventory (MCMI): A re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90, 55(3-4): 445-464
- Jankowski D. A beginner's guide to the MCMI -III.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 Butcher JN, Rouse SV. Personal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linical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6, 47: 87-111
- Millon T. Millon clinical multiaxial inventory III manual. Minneapolis, MN: National Computer Systems, 1997
- 李彦章. 临床应用中的人格评估. 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 1999, 16(2): 66-69
- 李彦章. 人格评估的临床应用.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9, 9(3): 173-175
- 杨坚,龚耀先. 几种常用人格问卷的比较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4, 2(1): 56-59
- Marlowe DB, Festinger DS, Kirby KC. Congruence of the MCMI-II and MCMI-III in cocaine depen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98, 71(1): 15-16
- Boyle G J, Déan LL.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illnes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and millon clinical multiaxial inventory-III in a heterogeneous sample of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0, 56(6): 779-791
- 吴明隆. SPSS 统计应用实务.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1
- 马文军.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如何用 SAS 软件分析. 中国卫生统计, 2000, 17(6): 345-346
- 金瑜. 心理测量.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Piersma HL. The MCMI-II as a treatment outcome measure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89, 45(1): 87-93
- Piersma HL, Boes JL. MCMI-III as a treatment outcome measure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 53(8): 825-831
- Blais MA, Daniel J, Holdwick JR, et al. Exploring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MCMI-III anxiety and avoidant personality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3, 81(3): 237-241

(收稿日期:2009-06-30)